

中华文化 基本精神概说

陆玉才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在全部的文化现象中，人是其现实的主体，也是其历史的负载体，不论生活怎样发生交易和革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精神，也总是在自身固有的逻辑程序里演绎着，前进着，如它不是它自己而是别的什么样子，那除非在长时期的生活进程里，销蚀了它的民族、国家的总体，即使如此，民族文化的许多基因也还会顽强地积淀在民族成员意识与行为中，这种不约而同地由精神现象到实践行为，又到物质对象的共同文化构成，正是铸造民族性格的血肉和筋骨。因此，一个民族要自觉地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其中成为强有力的群体，必须了解自身、建设自身、改进自身、发展自身，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民族新文化。离开民族文化传统要建立新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中华民族很有幸，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很丰富，丰富到一个人用一生的精力去了解中国到底有多少文化，也还是顾此而失彼，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情况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没有的。一九八九年我访问美国，在华盛顿参观最古老的文化遗址是二百多年前留下的华盛顿故居；到犹他大学参观，他们给我们看的当珍宝收藏的著作是十七世纪印刷的书籍，这个年限的文化遗产，在中国真是遍地皆是，好像不上千年的文化都像近期文化似的。中国的这种久远的、丰富的、复杂的文化，由于从古至今人们一直缺乏对它的科学态度，尤其是去芜存菁的历史把握，所以人们经常处于应接不暇的繁重负担之下，以

致难以在文化传统面前显示出文化主体的态度，多是对象销溶了主体，而不是主体销溶了对象。中国文化史上许多不胜负担的激进人物，他们非“礼乐”，非“圣贤”，非“汤武”，非“孔孟”，非“纲常”，非“坟典”，非“经史”，非“文言”，非“国故”，等等，这要从历史发展过程的矛盾根源上看，无非是要在传统文化的重负之下，有一个摆脱负担的喘息之机。虽然其态度与方法是一片面有余，区别欠少，不可效仿。但是，反过来，对传统文化无分析地一概崇拜，一概颂扬，一概吸收，一概奉为金科玉律，那也是要害事的。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为“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写的题为《学习》的文章中，向人们科学的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的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个论断到现在已有五十七年的历史，那时的“小学生”，因为多种原因的阻碍，好像直到今天还没有升入“中学”，在方法上忽左忽右，二三其德，同是一个文化历史，同是一种文化对象，今天同声相应地说它坏，明天又异口同声地说它好，正道中行的态度太少见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仅要重新学习我们的中华文化史，弄清我们的中华文化精神，也更要改进我们的文化方法，一切都以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清理和研究民族文化，其目的是为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兴盛发展，为了继承发扬民族的文化智慧，为了提高民族自尊与自信心，为了创造民族的新文化。

近几年来，在中国已掀起了“文化热”，许多人从历史的正反经验教训中深切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人必须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充分了解和把握中国的文化，这不仅新时期促进社会发展前进所必需，也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所应尽的历史责任。在以前的很多时候，很多领域，常有“××文化在中国”，但“××文化却在××国”之说。就中国文化引起世界各国注重并来促进中国人的研究来说这不是坏事，但对于中国人的自立、自尊来说，中国的什么文化学都落后于外国，那中国的文化人不论在国人面前还是在外国人面前，都要无地自容了。

我早有这样的情结，忽然看到陆玉才同志的《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概说》的大样，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阅读后我发现还是一本到来及时的好书，不论就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

这本书概括了中国文化历史的深层精神，以“中华文化史的回顾”、“伦理类型的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几个互为联系的文化哲学范畴为建构网络，深入而具体地阐发了决定中国文化面貌及其共同走向的贯穿精神，读后使人有因枝振叶、纲举目张的豁然感悟。书中在阐述每个文化哲学范畴时，大体都有关于问题本来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评述，把史迹与论旨紧密结合了起来，给人留下立论扎实、思辨明晰的突出印象。如在阐发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分几个层次进行分析时，其中立有关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悟过程一节，书中从《周易》一直论述到清代，引录了许多典籍与人物的有关见解，足可见出立论的可信性。书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构成采取了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在揭示中国传

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构成特点时，并不是无原则的肯定，而是以处于现代视角上的今人的眼光加以评论，比较准确地指出了历史的局限及与现实的距离。如对于中国的伦理人本主义的局限性就曾指明，这种思想观念有道德至上的局限，以致重群体而轻个体，形成为中国社会的偏重于社会公利而轻视个人权益保证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分析是正确的，本书所阐发的中国文化哲学思想对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很有促进意义。如对中华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吸纳与化用，对于多民族的合作兼容与共存的思想等，都有很中肯的生动的论析，读后使人多增明智，论世导行都可以聪明许多。这本书的内容构成与写法，对读者具有广泛的适应注，在学术专门家面前，它以文化视野的博观取胜；在广大青年面前，它以文化历史知识的深厚取胜。

玉才同志是1964年从辽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他在毕业后不论工作遇到怎样没有想到的变换，但一直以勤恳不倦的态度对待工作，研究问题，他总是努力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把工作做得出色，这是知道他的为人行事的师友们所公认的。近几年中一直热心于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不长的时间里即有这样一本比较系统的专著出版，这正是他深厚的学问功底的非偶然的外化表现，明天总是今天的自然延续，我相信，他有这种厚积的功底和一直执着不变的态度，他还会在今后研究中取得更新的成绩，创造更多的成就。

1995年12月25日

于辽宁大学望云斋

卷首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象辞》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象辞》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
而道中庸

——《中庸·二十七章》

致 读 者

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其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还指出：“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大量历史资料和生动的现实证明，在数千年中华文化史中积淀的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华文化基本精神，不仅激励、凝聚和整合着中华先民的雄健步履，推动他们创造辉煌业绩，而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它特有的功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中国亿万人民，面向未来，走向世界，仍将从这笔丰厚的遗产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巨大力量。

记得有人说过，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抽象的理论思辨；既不是某种特殊背景下一时的激情，也不是某种条件下的偶然行为。它是一种贯之以一的情感、信念、品格和行为的追求。爱国主义是以人的需求，尤其是以心理上的需求为前提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一生下来就有一定的依附感，这包括对环境的依附，对群体的依附，对他人的依附，对文化与传统的依附等。这些“依附”形成了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并由此产生对乡土的依恋，对亲朋故友的深情，对传统的认同，对民族的自豪以及进一步对祖国的热爱。这种心理需求越强

烈，人的爱国之情越深厚，报国之志越自觉。

总结传统文化，探求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涵，就是为了满足人们这种强烈的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对祖国的自豪感，进一步加深爱国主义情怀。

文化史家一再告诉我们，人类从动物界中分离和提升出来之后，其社会进化和人本身“终极关怀”的指向是“求真”、“崇善”、“爱美”，然而人类的进化不是单向直线的进程，在其进化的过程中，不出现异化和退化。为了揭示和弥补异化和退化的缺憾，使人类理性的发展自觉地走向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就需要不断增进人们的文化思想修养。中华传统主流文化——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在70岁以后总结自己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从2500年前的古代传递至今的信息，恰好证明了上述思想观点。提炼中华传统文化中堪称精粹的成果，使其在当今带给人们深刻的历史与理性启迪，应该是构建世纪之交中华崇高人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这是件比较艰巨的工作，更是颇有意义的工作。唐代刘禹锡词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我们愿意承担这副重担，在开掘爱国主义宝贵资源，弘扬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方面，以尽绵薄之力。

(辽)新登字第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概说/陆玉才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11

ISBN 7-5610-0000-46

I 中… II 陆… III. 文化—思想性—研究—中国
IV. G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22430号

中华文化基本精神概说

陆玉才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实验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200千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8500

责任编辑: 蒋秀英 李文禄 封面设计: 长征 刘桂湘

责任校对: 沈飞

ISBN 7-5610-3084-3

G·1026 定价: 7.50元

目 录

序	王向峰 (1)
卷首语	
致读者	(1)
一、中华文化史的回顾与传统文化的鸟瞰	(1)
1. 源远流长的文化史	(1)
2.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9)
二、伦理类型的中国文化	(33)
1. 产生中国文化的条件	(33)
2. 伦理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	(46)
三、天人合一	(64)
1.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64)
2. “天人合一”观念的演化过程	(68)
3. “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	(82)
4. “天人合一”思想的时代意义	(91)
四、以人为本	(99)
1. “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	(99)
2. “以人为本”思想的传统功能	(105)
3. “以人为本”思想与伦理人本主义的功与过	(126)

五、贵和尚中	(132)
1. 中国历史上的“和同之辩”	(132)
2. “重和去同”思想的多方面渗透	(137)
3. 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	(155)
4. “贵和尚中”思想的历史价值	(159)
六、刚健有为	(163)
1. “刚健有为”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163)
2. 中国历史上的动静之辩	(163)
3. “刚健有为”精神的多方面表现	(169)
结束语：弘扬文化基本精神与挖掘爱国主义	
教育资源	(195)
先秦文学名著名篇中的民本思想及其对后世	
的影响	(203)
红学之诞	(220)
后记	(241)

一 中华文化史的回顾与 传统文化的鸟瞰

作为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其它民族无可比拟的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史，在这悠长的文化历程中，中华先民及其子孙们为世界贡献了有如日月般灿烂夺目的文化成果。掌握和探索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应该从这里起步。

1. 源远流长的文化史

据先秦史籍和考古研究，古汉族自称的上古时的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因自认为居天下之中央，故称中国，而将可知的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尽管在此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的《何尊》：“武王既克大邑周，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治民。”周厉王时的诗作《诗经·大雅·民劳》中写：“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庄子·田子方》篇中也有这样的用词：“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当然“中国”一词在这里的内涵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但可以说是最早的出处了。

中华民族的历史要从中国人的起源说起。考古资料证

明，中国人的起源大大早于“中国”一词使用之时。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 170 万年的猿人化石，元谋猿人是中国境内最早从事人类活动的中国人。从元谋人、蓝田人（陕西蓝田泄湖镇发现其化石）到马坝人（广东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山岩洞中发现其化石），长阳人（湖北省长阳县城西南下钟家村发现其化石），再到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发现其化石），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证，一脉相承地显示着进化的趋势。据考古学实证，距今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熟练地使用火，并能有效地保存从自然界取来的火种，在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人们看到了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石块、骨骼。恩格斯说：“就世界性解放作用而言，磨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由此说明，中华民族早在诞生之初，就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距今约 4000 年前，黄河中游一带开始出现了农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许多圆形的、方形的房屋地基，地面堆积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粮食米粒以及吃剩的螺蛳壳和蚌壳等，在居住区的外侧，有一条深宽各约五六米的沟，可能是作为防御用的。在中国民族跨入文明时代门槛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此后经从殷商到西周的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大约在春秋时代，中华民族活动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黄河中游和下游流域。战国时代，中原诸侯忙于互相征战兼并，南方的楚族势力向北伸张，进入淮河流域。北方的匈奴也乘机崛起，侵入肥美的鄂尔多斯草原。在西部，中华民族沿着渭河河谷继

续向西发展，到达黄土高原的西陲。当时中华先民的政治和文化活动，是以黄河及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河谷为轴线，由东向西展开。中国几个著名古都长安、洛阳和开封等，都分布在这一轴线上，这一古文化轴，从中华文化传统来看，偏在西北。

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国的争雄竞争，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文化高峰。这五百年也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到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而告一段落。从分布全国各地的先民遗址和古人类化石，到春秋战国后大小国家的统一，就可以清楚地确定，中华民族从一诞生就是多元一体格局。从战国到秦汉时修建的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防线。牧民平时“逐水草而居”，一遇灾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会成群结队，南下就食农区。面对这种严重威胁，个体小农是无法抗拒的。于是不能不依附于可以保卫他们的武力，和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力量来建筑防御工程的权力。这也是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

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出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考虑，均定都在关中；后来终因黄河下游流域农业发达，便于得到东部地区粮食供给，东汉又改都洛阳。秦皇汉武时代的封建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可以在世界史上做一比较。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唯有罗马。当然，秦汉的人口和物产，绝大部分仍然集中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南方几乎等于空白。司

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货殖列传》）。当时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尚属“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东汉时应劭在给《史记·平淮书》作注说：“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也。”可见当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东汉末年的政局混乱和匈奴的入侵，中华民族开始向南作较大规模的扩散。三国鼎立，除北方的曹魏，南方出现了吴、蜀两个政权。当时中华民族的中心仍在北方，吴蜀只不过收容了南来的人口，必须加强土地开拓，推动了南方经济发展而已。《全晋文》记载晋给事中袁淮劝曹爽宜捐淮汉已南书中说：“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对抗。然自上世以来，当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从这段文字中看出，晋人尚未视南方为中国；南方人民还是外化之民。

汉作为一个民族是汉代和其后中原的人和四周外族^①人接触中产生的。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秦人或汉人自认为秦人或汉人都是出于别人对他们称作秦人或汉人。汉族这个名称不能早于汉代。有人说汉代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大体可信。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侯接触和混杂的时候。当时中原原有居民在外来人看来是一种“族类”而以同一名称来称呼，说明汉人已经事实上形成一个民族实体。

中华民族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都远远超过南方。自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才初步改变了这一传统状况。中原居民为了避乱，进行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南方因劳动力和知识分子的增加，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受到深刻影响。隋唐之际，北方依然发展繁荣，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频频进行。与公元前七世纪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的同时，杨隋和李唐在东亚大陆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造就出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洪流巨涛中，中华民族迈入了气势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唐代是中华文化的高峰。它的特点表现在开放性和开拓性上。这一特点至今与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密切相关。唐代的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各族的混血。有人统计，唐朝宰相 369 人中，胡人出身的有 36 人，占十分之一。以中兴唐朝出名的庄宗本身就出自沙陀人。可以说，有唐一代名义是汉族统治，实际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从唐到宋之间的五百年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非汉民族被当地汉人所融合成为汉人，许多历史有记载的如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唐代初年，黄河以北尚富饶，民用殷实，但不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新唐书·食货志》中说：“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此时，南方的经济发展可谓赶上了北方，南北均势开始打破，但文化中心仍居北方。中华民族向东南推进的又一大波澜是大唐帝国衰微标志——安史之

乱。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经过浩劫、残破不堪相比，南方的州郡，人口显著增加，在经济上北方愈来愈殷切地依赖南方的经济。《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府君神道碑》中说：“天宝以后，中原释耒，犂越而衣，漕吴而食。”唐李肇所撰《国史补》亦载：“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唐代诗人都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今天下以江南为国命”（杜牧）。由此可见，全国经济重心已经向南转移。

鉴于全国的经济重心虽已偏处东南，而政治和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下游流域的事实，北京统治集团采取了“竭三吴以奉西北”的政策。“靖康之难”的金人入侵是中华民族南迁的第三次大波澜。金王朝统治北方一百多年，以淮河和秦岭为界，跟偏安的南宋政权对立，于是北宋的灭亡成了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但这又成了赵宋王朝文化大步演进的难得机遇。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的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南宋人因家破人亡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渗透于宋王朝的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北方各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了丰富的营养。这一情势，甚至使两宋的教育、科技异常发达。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之后，人们在谋生之余尚有闲暇，才想到用剩余的时间和精力读书，使文化随着人心的向上而进步。《陆象山年谱》记录了这一具体景况：“先生既归，学者辐辏，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每诣城邑，环座率二三百人；至不能容，从寺观。县官为设讲习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途巷。又